

法國漢學家沙畹中國考古調查之緣起*

賀夢瑩

〔提 要〕 法國漢學家沙畹是近代最早以科學考察為目的來華的西方學者之一。他分別於 1891 年和 1907 年兩次在中國開展考古調查,其緣起是時代潮流與個人選擇交織作用的結果。19 世紀末,中國國門洞開、西方學界對遠東考察熱潮的興起、法國相關制度與基金的支持,以及跨國交通日趨便捷,為沙畹來華考察奠定了外部基礎。他首次申請考察項目,是在外交仕途受阻後對學術道路的堅守;第二次考察則是長期積累後的主動規劃,足跡遍及保存有中華文明重要古跡的華北地區。沙畹與弟子伯希和圍繞雲岡石窟首次考察權的“爭”與“讓”,折射出他在堅持學術操守與提携後學之間的審慎權衡。沙畹將現代考古學理念引入漢學領域,推動了法國漢學從“書齋研究”向“田野考察”的轉型,亦為中西學術交流留存下大量珍貴資料。

〔關鍵詞〕 沙畹 法國漢學 中國考古調查 華北地區 中西學術交流

〔中圖分類號〕 K87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00 - 11

法國漢學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是最早以研究為目的來華考察的西方學者之一,其主要貢獻之一便是將現代考古學的理念與方法引入漢學研究領域。沙畹一生兩次來華:第一次是 1889 年 3 月至 1893 年 7 月。他從巴黎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哲學專業和法國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今法國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學院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漢語專業畢業後,受法國外交部派遣,以不領取工資的“授權隨員”(attaché autorisé)身份^①在法國駐大清公使館工作,以進一步學習漢語並從事漢學研究。第二次來華是在 1907 年 3 月至 11 月,他在華北地區開展地面文物考古調查,足跡遍佈遼寧、吉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等地。

關於沙畹的考古調查,學界多聚焦於其 1907 年的考察成果,如對泰山、高句麗遺址及佛教石窟的研究,同時也關注他所接受的考古學訓練。^②學界通常將沙畹 1889 年至 1893 年的在華旅居視為一個整體,認為這是他在中國學習與研究的四年。期間,儘管沙畹曾順道考察武梁祠和泰山,但學界並未將這些活動視為官方派遣的科學考察。然而,本研究最新發現,沙畹在第一次旅居中國期

*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法國漢學巴黎學派與中國現代學術的形成與發展研究”(項目號:20CZS04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間,曾於 1891 年 1 月至 11 月返回法國,重返中國時獲得了一項由教育部資助的科學考察任務,其中就包括對武梁祠的考察。因此,1889 年至 1893 年沙畹的第一次中國旅居實際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889 年 3 月至 1891 年 1 月,是他以“授權隨員”身份在法國公使館學習和工作的時期;第二階段為 1891 年 11 月至 1893 年 7 月,是其受法國官方派遣與資助,開展第一次中國科學考察的時期。1907 年的華北考察實際上是沙畹的第二次科學考察。但奇怪的是,沙畹本人從未提及第一次受資助的科學考察,故此事一直不為人知。

沙畹的考察既是國際局勢與學術潮流的產物,也體現了個人的學術選擇。本文依託法國外交部和教育部原始檔案,以及沙畹的書信與著作,從社會背景與個人選擇的視角,探析沙畹中國考察的緣起與動因。釐清這一脈絡,不僅有助於更清晰地理解法國漢學從“書齋研究”向“田野考察”轉型的內在邏輯,也可補充近代法國漢學家對華考古調查的早期歷史,並為清末中外文化交流的多樣性提供實證支持。

一、緣起之基:19 世紀末的國際局勢與學術潮流

一方面,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逐步向西方開放,甲午戰爭的失敗又使中國失去部分領土,進一步淪為列強爭奪殖民利益的重要舞台。另一方面,西方探險家與考古學家的目光也逐漸從希臘、羅馬、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轉向遠東尤其是中亞地區。在這一背景下,各國圍繞科學考察與探險展開了激烈角逐。例如,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於 1883 至 1901 年間四次深入中亞,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Aurel Stein)亦於 1900 至 1901 年間首次進入中國新疆進行考察。在英、俄等國主導的西域考古探險熱潮推動下,1902 年在德國漢堡召開的第 13 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上,正式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考察國際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exploration historique, archéologique, linguistique et ethnographique de l'Asie centrale et de l'Extrême-Orient)。為爭奪學術話語權,法國亦相繼設立專門機構和基金,資助遠東及中亞地區的考古調查活動,這為沙畹的中國考察提供了時代契機。

長期致力於古跡、文獻與語言研究的法蘭西金石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於 1886 年設立“嘉爾業基金”(Fonds Garnier),旨在資助考察隊在非洲中部及中亞地區開展考古學、歷史地理學、語言學和民族學方向的調查。^③1898 年 12 月,法國在越南西貢成立“印度支那考古學調查團”(Mission archéologique permanente en Indo-Chine,即後來的法國遠東學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以加強對南亞、東南亞和東亞文明的考古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研究,其研究範圍亦涵蓋中國。此外,自 19 世紀末起,法國先後派遣多支考察隊前往中國西部及邊疆地區。1889 至 1890 年,探險家邦瓦洛(Gabriel Bonvalot)及其贊助人亨利·奧爾良親王(prince Henri d'Orléans)穿越新疆、西藏、四川、雲南等地,進行地形學和動物學觀察;1890 至 1895 年間,呂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考察團在新疆、蒙古和西藏開展語言學與考古學調查;1895 至 1896 年,外交官兼探險家保寧(Charles-Eudes Bonin)則在四川、甘肅、新疆和蒙古等地進行考察。

沙畹的考察不僅順應時代潮流,也回應了漢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自 19 世紀初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設立“漢、滿——韃靼語言與文學”講席以來,法國的漢學研究便注重以語文學為基礎的文獻翻譯與詮釋。到沙畹時代,學者們已意識到傳世文獻的局限性,同時獲得了前輩學者未曾有過的親往中國考察的機會,亟需通過實物資料豐富研究素材並驗證文獻記載。沙畹的在華考察,正是法國官方在制度與經費上大力支持的具體體現。

在制度層面，法國教育部負責組織專家對學者研究計劃的學術性與可行性進行評估。沙畹在申請 1891 年考察時，曾向教育部提交詳細的研究計劃，內容包括：完成《史記》法譯本的完整翻譯；對武梁祠漢代石刻進行“考古研究”，並“從這座被認為是最古老的中國藝術遺跡中，複製所有值得廣泛傳播的神話與歷史場景”。同時，他還不忘關注“當代中國的風俗習慣與制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一古老文明進行綜合研究，揭示其在歷史上的形成過程以及在當代的生存與發展”。^④該計劃經“附屬於教育部的歷史與科學研究委員會”評審通過後，獲得教育部支持。在第二次考察申請中，沙畹同樣首先向教育部遞交詳盡的考古調查計劃與路線圖，內容包括：一、遼河盆地——研究公元十世紀在此建立的契丹王朝的遺存；二、山東泰山——以豐富的金石文字資料為基礎，撰寫一部關於朝聖地泰山的專著。^⑤考察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從契丹王朝舊址與泰山兩地搜集碑銘資料；二是考察一些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地點，如北京、曲阜、河南府、西安、成都。^⑥

其次，法國外交部則負責為學者辦理赴華護照及相關派遣事宜。教育部授權沙畹進行考察後，即與外交部對接，由外交部進一步處理派遣事宜。沙畹在第二次考察前，曾於 1906 年 10 月 21 日申請赴華考察，24 日致信教育部長，希望教育部儘早審核其申請，並提前通知外交部為其辦理護照，以免行政手續遲緩延誤行程。^⑦而外交部僅用半個月便辦妥了沙畹的外交護照，並聯繫好了常規需 4 個月才能完成的中國護照申請手續，^⑧充分體現了法國官方機構的高效協作以及對沙畹考察的重視。外交部還負責將赴華旅行者的官方身份與來華目的告知清政府，協調辦理中國護照並安排沿途接待。沙畹在申請中國護照時特意請求法國外交部提及自己的研究成果：“曾發表多部有關中國歷史、考古、金石學的著述，尤其是翻譯了司馬遷《史記》，並撰寫了一卷有關山東武梁祠的論著”，同時希望在護照上注明其“第三等第一品御賜雙龍寶星”的榮譽頭銜。^⑨他期望借助學者身份與榮譽頭銜，在護照申請及考察過程中獲得更多便利。事實也如其所願：“凡經過各處，地方官均皆優加接待，百端助考，以致考究一切無不易於措手。”考察結束後，沙畹委託法國公使潘蓀納（Jean-Baptiste Boissonnas）向清政府外務部遞交感謝照會，特別感謝前盛京將軍趙爾巽、道員彭谷孫、前山東巡撫楊士驤及該省洋務各員、開封道員韓國鈞、登封縣知縣王雲漢、前陝西藩司馮汝驤、山西藩司寶棻、大同知府翁斌孫、縣令沈繼焱等人。^⑩1907 年 9 月及 11 月的《大公報》（天津版）也曾兩次報道沙畹在山東的考古調查，均提及他受到當地官員的接待與協助。由此可見，在外交部的協助下，沙畹的官派身份、學者身份及榮譽頭銜在考察中為其提供了重要庇護與便利。

在經費保障方面，沙畹的兩次考察均獲得了官方資助。第一次考察由法國教育部提供為期三年、每年 5,000 法郎的資金支持；第二次考察的經費來源更為多元，分別由法國教育部、法蘭西金石與美文學院及法國遠東學院提供 5,000 法郎、6,000 法郎及 6,000 法郎，^⑪為考察期間的各項開支提供了充分保障。

同一時期，交通條件的改善也為學者赴華考察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沙畹 1889 年首次來華時，乘坐法國郵船公司（Compagnie des Messageries Maritimes）的薩哈林號（Saghalien）郵船，1 月 24 日從馬賽出發前往上海，3 月 21 日抵達北京，途中多次周轉，單程耗時近兩個月。^⑫而 1907 年第二次來華時，他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不僅直達中國東北，行程時間也縮短至半個月。西伯利亞大鐵路東段於 1891 年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車里雅賓斯克兩端同時動工，1904 年全線通車，收尾工程延續至 1916 年。其中外貝加爾至符拉迪沃斯托克段取道中國黑龍江、吉林兩省，不僅縮短了鐵路長度，節省了建設資金，也增強了俄國對東北地區的影響。^⑬沙畹在 1907 年的考察申請中描述路線時，第一步就是乘坐西伯利亞大鐵路火車抵達中國。^⑭可見，鐵路的暢通為沙畹深入中國內陸考察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因此可以說，國際學術潮流與法國政策導向為沙畹的考察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沙畹等一批漢學家得以親往中國開展學習和考察工作。

二、緣起之核：沙畹的學術追求與人生選擇

如果說沙畹的考察得益於便利的外部條件，那麼其考察的內在動因則是個人的學術追求與人生選擇。兩次考察的緣起分別對應沙畹人生的兩個關鍵轉折：第一次因外交仕途受阻而轉向學術，是“被動選擇”中的主動堅守；第二次則是學術積累成熟後的主動規劃，是“個人興趣”與“學術考量”的完美結合；而沙畹與其弟子伯希和（Paul Pelliot）有關雲岡石窟考察優先權的互動，正是體現這一特徵的關鍵細節。

（1）外交仕途受阻後的學術堅守

沙畹的第一次考察，事實上是在其外交仕途受阻後對學術道路的堅守。1891年1月至11月，沙畹曾返回法國10個月之久。此番歸國並非為了休假，也非為後續的科學考察做準備，而“唯獨”（uniquement）是為了參加法國外交部於當年7月份組織的外交官資格考試，為此他甚至自行承擔了返回法國的全部費用。沙畹希望步入仕途的想法，應當與其在法國駐大清公使館從事漢學研究期間所享有的諸多便利密切相關。公使館為他提供了安全、舒適的生活環境，而且近兩年的使館生活讓他不僅熟悉了公使館的人員和工作，還贏得了各級負責人對其能力的認可和對其外交官仕途的支持，如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戈可當（Georges Cogordan）、外交部駐北京辦公室主任及全權公使李梅（Victor-Gabriel Lemaire），以及法國駐華臨時代辦林椿（Paul Ristelhueber）等人。^⑥因此，對當時的沙畹而言，如果能成為一名外交官，不僅可以繼續留在公使館，還可以成為領取薪俸的正式職員。

1890年9月20日，李梅在致外交部長勒內·葛布萊（René Goblet）的信中，最早記錄了沙畹希望“成為公使館正式員工”的想法。李梅稱讚沙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受過高等教育，舉止得體，品行端正”，並評價其近兩年在公使館的工作“非常令人滿意”，因此向外交部長推薦沙畹，認為“那將對外交部大有裨益”。^⑦不過，作為巴黎高師曾經的學生，沙畹自1885年入學之日起便與法國教育部簽訂了一份為期十年的教學合同，這意味著1885年至1894年間，他必須專職於公共教育事業，圍繞學習、研究及教學開展工作，不能從事其他職業，他也因此獲得了免服兵役的特權。^⑧至1891年沙畹申請參加外交官資格考試時，他與高師的合同僅履行至第六年，正常情況下是不能轉行的。由於這一特殊身份，面對沙畹的申請，各相關機構負責人的意見並不一致。有人認為可參照某條“針對公使館隨員參加特殊考試”的法令，允許沙畹參加外交官考試，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沙畹受合同約束，不得參考。這導致沙畹當時雖已自費返法，卻突然被告知不能參加考試。為爭取考試資格，他積極致函各方負責人，並向外交部長葛布萊提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即“在合同期滿前放棄作為外交人員的所有工資”，同時只申請“名譽三等秘書的職位”，這將保證他可以“註冊在外交部的《法國外交與領事年鑒》名冊上（l'inscription dans l'Annuaire du Département）”，^⑨並有權利在外交官仕途中獲得正常晉升”。^⑩由此可見沙畹當時渴望成為外交官的決心與強烈意願。最終，經過不懈努力，他如願獲得了參加外交官考試的機會。^⑪沙畹於1891年7月6日參加考試，取得第13名的成績。^⑫不過，根據後來多封法國外交部、教育部及陸軍部之間的往來通信及相關檔案可知，沙畹雖符合外交部錄取條件，卻無法被立即任命為三等秘書。他必須履行完與教育部簽訂的教育

合同中剩餘的4年,方能免除服兵役義務,或者立即履行一年兵役,之後方可正式進入外交部。^② 1891年7月27日,沙畹在致外交部人事部主任拉布雷(Charles-Camille Labouret)的信中也提到,“個人情況尚未完全解決,但相信只要保證在下次休假期間完成一年的服兵役,就會被任命為‘正式隨員’(attaché régulier)”。^③

不過,沙畹似乎試圖尋求一種兩全其美的方法(combinaison),既可履行合同規定的剩餘4年義務以避免服兵役,又能保留外交官職位。因此,在外交部部長辦公室主任戈可當的建議以及高師校長佩羅(Georges Perrot)的推動下,沙畹在申請外交官考試的同時,也申請了一項科學考察任務。^④ 1891年5月2日,在等待獲准參加外交官考試的同時,沙畹向法國教育部長萊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申請了一項為期三年的中國研究和考察任務(mission d'études et d'exploration),內容包括完整翻譯《史記》,以及對武梁祠石刻進行考古研究。此項研究計劃於同年7月16日經“附屬於教育部的歷史與科學研究委員會”評定,認為“派遣沙畹先生赴中國進行學術考察與研究任務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⑤

可以說,沙畹幾乎是同時獲得了外交部的錄取結果和教育部的考察授權。而他最終選擇首先執行考察任務,實為一舉多得:既可保障他在繼續自由研究的同時履行高師的合同規定,又可獲得收入,同時還保留了未來被任命為外交官的權利。因此,1891年11月返回中國時,沙畹是帶著考察任務和資助而來的。不過,他似乎並未再次前往武梁祠進行實地考察,而是基於手頭已有資料完成了對武梁祠拓片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並於1892年3月30日將考察成果——74張畫像石拓片(其中8張為重複)和考察報告——寄給了法國教育部。^⑥ 這項成果於1893年出版,成為沙畹的首部漢學論著《兩漢石刻考》(*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之所以推測沙畹未再前往實地考察,主要是因為他自己從未在任何出版物中提及受資助考察武梁祠的經歷,僅提到1891年1月從北京至上海返回法國的途中曾路過並考察了武梁祠。或許他原本計劃在3年考察任務的後半段再訪武梁祠,但因1893年4月29日當選為法蘭西學院“漢、滿——韃靼語言與文學”講席教授而中斷了這一計劃。隨著沙畹於1893年5月15日和19日分別向法國駐大清公使館和法國外交部提交辭呈,^⑦並於7月1日離開中國,^⑧其第一次中國旅居也就此告一段落。

(二)學術考量與知識儲備

如果說沙畹的第一次考察是外交事業受阻後的臨時決定,那麼第二次考察則是經過十餘年學術積累後的主動規劃。但歸根到底,沙畹的考察均為基於學術考量、有備而來的學術實踐。

首先,在考察區域的整體選擇上,沙畹將重心放在華北地區,這與當時以西域探險、搜求文物為目標的學者或探險家形成鮮明對比,體現了他始終以學術為核心、以研究為導向的追求。沙畹自1889年旅居中國期間即開始著手譯注司馬遷《史記》,直到1907年再度來華考察前,方將全部譯稿交由吉美博物館保存,為翻譯工作畫上句號。這項工作持續約20年之久,是其一生中耗時最長、投入精力最多的著述。^⑨ 而他以漢代為中心對中華文明核心區域進行的實地考察,實則是在《史記》翻譯與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實地踏查對中國歷史進行驗證與補充。早在第一次申請考察時,他便計劃研究“當代中國的風俗習慣與制度”,並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一古老文明進行綜合研究,揭示其在歷史上的形成以及在當代的生存與發展過程”^⑩。而華北地區正是中華古老文明保存、發展與嬗變的核心地帶。1907年的第二次考察,更是對這一核心區域進行整體、全面研究的延續。是年3月27日至11月9日,沙畹足跡遍及華北地區及遼寧、吉林、山東、河南、陝西等地,考察內容包括東北高句麗古墓、山東漢代畫像石、泰山、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陝西唐宋帝陵,以及沿途

名山、寺廟等地上古跡。

沙畹曾兩次申請並考察武梁祠，足見其對該地的重視。而他之所以選擇武梁祠，主要原因在於對該地的知識儲備遠超其他地方。早在學生時代，他便觀看過英國駐華公使館醫師卜世禮(Stephen Wootton Bushell)在1881年柏林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上展出的武梁祠拓片^②，閱讀過英國軍官杜德利·A. 米爾斯(Dudley A. Mills)在遊記中記錄的1886年實地考察武梁祠畫像石的見聞，也翻閱過法國外交官、史學家毛里斯·巴列奧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在《中國藝術》(*L'Art chinois*, 1887)一書中對武梁祠石刻的簡要介紹。^③因此，沙畹在來華前已具備一定關於武梁祠的知識基礎。而自著手翻譯《史記》後，他對漢代及之前的歷史理解日益深入。武梁祠作為與司馬遷同時代之人建造的家族祠堂，其石刻不僅反映了漢代人的日常生活、信仰及風俗習慣，是以圖像形式保存的民間文化記憶圖鑑，更是佛教傳入前中國最早的祠堂藝術形態，在中國歷史與考古學上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因此，當沙畹途徑山東泰安，見到街頭有武梁祠石刻拓片出售時，雖未事先安排，仍決定立刻繞道前往實地考察，並搜集到部分畫像石拓片等原始資料。^④此後，當外交官仕途受阻，沙畹臨時決定申請中國考察時，武梁祠便成為不二之選。他既有知識儲備，又初步積累了實地調查的經驗與資料，因而在短時間內構思出富有說服力的考察計劃，並有效產出科研成果。

與第一次考察的臨時起意不同，沙畹1907年的華北考察則是其圍繞考古學考量進行的長期知識儲備與主動規劃。他在法蘭西學院的授課與研究內容，皆可見與此次考察密切相關的學術脈絡。

沙畹曾於1902~1903學年講授“西安考古博物館(碑林)之古跡”，以西安碑林部分拓片為資料進行詳解；1906~1907學年，他開設“中國考古地理學”及“泰山儀式相關文本翻譯”兩門課程，前者利用中國金石學著作中記載的銘文，研究祭祀用青銅器、石鼓文、秦石刻、武梁祠畫像石、大秦景教碑、伊斯蘭碑、佛教石刻等內容；後者則依據泰山封禪、投龍等儀式文獻解讀相關儀典。^⑤這些課程顯示，沙畹考古調查的主要興趣在於中國金石學，而考察地點——如西安碑林、武梁祠、泰山——均為碑文與畫像石刻資料豐富的地區。此外，1902年，沙畹曾發表《龍門石窟考》一文，研究龍門石窟開鑿與造像歷史，首次指出龍門石窟和雲岡石窟在考古學上的重要意義。^⑥他將佛教石窟納入考古研究範疇，並在1907年考察期間重點探訪這兩處遺跡。同時，沙畹對鐵路交通亦做了充分考察，於1904年和1906年先後發表《滿洲鐵路圖》和《中國鐵路筆記》，詳述中國東三省以及全國鐵路交通的最新分佈和運行狀況。^⑦而1907年沙畹來華時正是經由俄國修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進入中國東北，可見其對交通的研究實為考察前的充分準備。可以說，前期的教學與研究，為沙畹的考察奠定了扎實的學術基礎。

(三) 個人興趣與學術話語權

沙畹對考古學抱有濃厚興趣，他曾表示：“考古對於研究中國宗教歷史的學者來說，是一泓豐富的知識源泉”。^⑧在巴黎高師求學期間，他師從考古學家與藝術史家佩羅，研究思路與考古方法深受其影響，非常關注歷史遺跡，尤其是石刻文字和圖像。^⑨1891年沙畹對武梁祠漢代石刻的研究，以及1907年根據“考古意義上的考量”而設計的考察路線，都體現出其考古興趣與實踐。

不過，在雲岡石窟這一考察地的選擇上，沙畹與伯希和曾存在重疊。沙畹原計劃的考察路線為：熱河(承德)—北京—開封—泰安—曲阜—開封—河南府(洛陽)—西安—成都，最後自上海離境。^⑩但實際考察中，他將最後一站由成都改為大同。這一變動並非臨時決定，而是與當時法國學界爭奪學術話語權以及沙畹自身的學術理想密切相關。

大同是沙畹關注已久的古跡。早在1902年寫作《龍門石窟考》時，他便已認識到雲岡石窟的

考古學價值，並對考察當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認為其是中國當時保存最古老、最具印度造像原貌特徵的佛教藝術遺跡。^④不過，這一地點同樣引起了伯希和的關注。他曾在 1902 年為《龍門石窟考》所作書評中表示：“希望有關雲岡石窟的研究能儘快完成，因為這些雕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結點，有朝一日我們一定能借此將中國藝術史、日本藝術史與受希臘藝術影響的印度藝術史聯繫起來。”^⑤1905 年 12 月 1 日，伯希和向法國亞洲協會(Le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提交的考察計劃中，已將大同列入 1906 年中亞考察行程，計劃在甘肅之後前往這座曾為佛教王朝都城並開鑿了眾多石窟的地方，因為那裡“至今尚無歐洲人踏足”。此外，如果時間允許，他還計劃前往龍門石窟，“盡可能多地拍攝一系列石窟照片以供研究”。^⑥對石窟的共同關注促使二人就“考察優先權”展開溝通，而這一互動恰是沙畹堅守學術興趣與立場的直接體現。

1906 年 5 月，沙畹致信伯希和，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我是第一個提出要考察雲岡石窟的人，這一古跡也是我計劃前往中國的主要目標，只是由於西伯利亞大鐵路停運，我的計劃至今未能實現。我打算明年 9 月或 10 月前往大同雲岡石窟考察。如果由於某種原因我未能成行，或者你比我先到，我很樂意讓你承擔這次考察任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因為你宣佈打算前去考察，我就必須認為自己不應再承擔此項任務。我並非要求你放棄，但我自然也不會放棄，因為畢竟我是第一個認識到這一遺址考古重要性的人。我希望你我之間能有一個明確的解釋，以免日後因此事引發不必要的爭執。^⑦

這封信既體現出沙畹作為師長對後輩的包容——“樂意”讓伯希和承擔考察任務，也彰顯了他對自身學術立場與學術興趣的堅守，不會因伯希和“宣佈打算前去考察”而放棄計劃。其根本動因在於維護法國漢學在中國核心古跡考察中的優先權。當時日本學界已開始關注雲岡石窟，1906 年，日本藝術期刊《國華》(The Kokka)刊登了伊東忠太實地考察雲岡石窟後的文章《支那山西雲岡石窟寺》，^⑧引發西方學界廣泛關注。沙畹與伯希和均意識到雲岡石窟的重要價值，以及作為歐洲漢學家代表首次系統考察該地的緊迫性。若因分工不明或考察順序不清而延誤或錯失考察時機，學術話語權很可能旁落，甚至被日本學界壟斷。

沙畹很可能原本計劃於 1907 年之前就考察中國及雲岡石窟，因西伯利亞大鐵路中國東省鐵路線已於 1903 年 6 月 1 日全線通車。然而，由於 1904~1905 年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地區爆發，鐵路經營權被日本奪取並一度停運，^⑨打亂並推遲了沙畹乘坐該鐵路線前往中國的計劃。1906 年 5 月，西伯利亞大鐵路恢復運行，使沙畹重拾考察大同的希望，更加堅定了他作為歐洲第一人親往考察的決心，因此特意致信伯希和，試圖爭取考察優先權。

筆者雖未能找到伯希和當時的回信，但需要指出的是，伯希和選擇大同作為考察地，應該並非有意與老師爭奪首次考察的機會，而更可能是受到沙畹的啟發，希望推進對該地的調查研究。1906 年，伯希和的中亞考察實際上是為了踏勘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遺址，重走歷史上的漢僧西行路線，並對佛教遺跡進行研究。^⑩因此，將雲岡石窟列入考察範圍顯得非常合理。而沙畹雖然在 1906 年 5 月希望與伯希和溝通，爭取考察優先權，但在同年 10 月遞交給教育部的考察計劃中，並未將大同列入自己的考察範圍，應該是為了避免與伯希和的考察地點相衝突。

在雲岡石窟的考察優先權問題上，沙畹行前多次嘗試與伯希和溝通。1906 年 12 月，他再次致信已在新疆考察的伯希和，由於不清楚伯氏的考察計劃，沙畹決定“暫時擱置對大同的考察，轉而打算對泰山、開封和洛陽的龍門石窟開展長期研究，尤其是在那裡修建鐵路的工程師們尚未對龍門

進行全方位的拍攝”。但他同時強調,如果伯氏不打算考察雲岡石窟,自己便會親自前往,“因為不能再讓這一遺址處於未被考察的狀態了”。^④伯希和在1907年4月14日的中亞考察日記中亦記錄了沙畹“已放棄了去大同府”的書信內容。^⑤可見,沙畹在考察前已決定將首次考察雲岡石窟的機會留給伯希和。然而,或許是一直未收到伯希和的明確答覆,1907年3月1日,沙畹在出發前告知伯希和自己的最終行程規劃:“3月28/29日從法國出發—北京(5月1日)—開封—濟南—泰山—曲阜—嘉祥—開封—洛陽—西安—太原—大同。”^⑥他將雲岡石窟列為行程的最後一站,以便根據情況靈活決定是否前往。1907年9月5日,沙畹致信法國東方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告知其已在中國完成陝西境內西安的考察,接下來將前往乾陵、韓城司馬遷祠和龍門,最後前往山西大同。^⑦可見此時,沙畹已確定前往雲岡石窟考察。他最終於10月23日至27日考察了該地,成為首位系統考察並記錄該石窟的歐洲學者。

而伯希和因長時間在甘肅敦煌等地考察,位置偏僻,通信受阻,未能及時收到沙畹及其他友人的信函,也未能及時回覆。他最後一次收到沙畹的來信是在烏魯木齊時,即1907年5月8日至18日沙畹在北京期間,之後便失去聯繫,“不知道沙畹活動的任何內容”。直到1908年7月,他才從法國印度學家色納爾(Emile Senart)早前寄給他的書信中了解到沙畹的考察進展,“已從考察中帶回了一批豐富的寶貴文獻”,並得知沙畹已考察了雲岡石窟。此時距離沙畹中國考古結束已過去9個月。伯希和在1908年7月7日回覆色納爾的信中,提到自己對中國東部遺址的考察計劃可能會改變,因為繼沙畹之後,“在大同和龍門再不會有更多的事可做了。尤其是他(沙畹)可能會拍攝很多精彩照片。由於這種原因,至少是對於大同,我應該根據情況而修改自己的計劃。但這是一種可以預見到的事件。理所當然,大同將是沙畹與我二人之間,看形勢促使我們誰能按時到達的一個賽場。”^⑧可見,儘管伯希和自敦煌之後繼續東行,但並未再前往雲岡石窟,而是於1908年8月至9月在陝西乾陵、西安等地停留約一個月,之後前往河南考察龍門石窟。在這些考察地,他同樣搜集了拓片,考察了皇陵雕塑、佛教雕塑以及碑銘等古跡。不過,他田野考察的時間都不長,主要以採購古籍、拓片和市場上販賣的古物(如銅鏡、錢幣、陶器、瓷器等)為主。^⑨

在考察大同這一問題上,沙畹與伯希和之間雖存在競爭關係,但作為老師、當時漢學界的領軍人物以及大同遺址考古學價值的挖掘者,沙畹並未自視甚高,也未對年輕有為的學生表現出任何嫉妒或打壓,反而主動將首次考察的機會留給對方,體現了師者對後輩的提攜與寬厚胸懷。而當發覺對方可能無法前往或無法先於自己考察時,沙畹又會毫不猶豫地爭取機會。這一過程展現出沙畹在個人學術興趣與法國學術話語權雙重驅動下的主動協調——既不願因內部爭議錯失研究時機,也不願放棄自己最早發現的學術目標,本質上是對具有考古價值但未系統研究的古跡的學術追求,更是法國漢學在國際競爭中爭奪話語權的時代折射。

餘 論

清末沙畹的兩次中國考察,既是時代浪潮的推動,也體現了個人的學術選擇。一方面,他的考察順應了當時西方國家探索遠東及中亞地區的學術熱潮,以及法國漢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因而獲得了政府部門與官方機構的大力支持。其考察申請的緣由及具體實踐,或為沿途停留,或因仕途不順而臨時決定,或得益於鐵路開通帶來的交通便利。這些因素看似偶然,但追根溯源,無不體現其一貫的學術追求。

作為最早意識到中國亟需建立自身考古學學科的西方學者之一,^⑩沙畹的考察在實踐層面與

此前及同期的其他考察團有明顯區別。在地點選擇上,他避開了當時備受關注的中亞及中國邊陲地區,轉而深入內地,尤其深耕中華文明古跡保存最為豐富的華北地區,既體現了其個人的學術興趣,也反映出對學術空白的敏銳把握。在研究方法上,沙畹以實證主義史學為指導,採用實地測繪、古跡攝影、碑銘拓印等現代考古方法,大規模、系統性地搜集拓片,大量拍攝古跡照片,並將其視為可與傳世文獻並重的研究材料。在對待文物的態度上,他並不致力於搜集、求購乃至掠奪珍稀文物,而是以勘察和記錄地面遺存為主,主張將古跡保留於原址,認為這是最佳的保護方式。這一態度與同期許多學者及探險家的文物掠奪行為形成鮮明對比,也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文物的記錄者與保護者。

沙畹之後,其弟子馬伯樂(Henri Maspero)、葛蘭言(Marcel Granet)及謝閣蘭(Victor Segalen)等人在其指導與啟發下,先後深入中國各地開展實地考察,繼承並發展了他的考察理念與方法。他們的考察區域不僅覆蓋沙畹所涉足的華北地區,更擴展至四川、浙江等其未曾深入之地;研究內容也從中華文明古跡延展至對當時社會、宗教及習俗的觀察與記錄。可以說,沙畹的考古調查不僅奠定了他在漢學界的學術地位,也推動了法國漢學研究範式從“書齋研究”向“田野考察”的重要轉型,將研究材料從傳世文獻擴展至考古實物,從而助力法國漢學在二戰之前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

清末西方學者來華考察,並非單一的文化掠奪與文物外流。以沙畹為代表的學者對地上古跡進行系統科學的記錄與考察,為後世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此外,清末中國學界之所以在文物研究中處於被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本土尚未形成現代考古學體系。沙畹對考古學重要性的早期認知,以及他利用傳世文獻與考古實物互證的研究方法,為歐洲漢學注入了新的視角與思路,儘管未必直接影響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未必直接開啟了中國考古學,但其研究方法與保護態度,對中國考古學建設仍具有啟發意義。他堅持科學考察、保護歷史古跡的理念,對當代中國文化遺產的保護與研究,仍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對沙畹考察緣起的梳理,不僅有助於補全法國漢學發展的歷史脈絡,也為重新審視清末中外交流的複雜圖景提供了重要個案。

① 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Instruction publique, le 17 juin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② 主要研究著述包括:劉曉:《法國漢學家沙畹及其泰山研究》,山東泰安:《泰山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吳博:《沙畹與高句麗的歷史遺跡研究概述》,哈爾濱:《哈爾濱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He Mengying, *Édouard Chavannes, fondateur de la sinologie moderne*, PhD dissertation,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PSL, 2019;趙飛宇:《沙畹1907年北華考古學考察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賀夢瑩:《論法國漢學家沙畹的中國佛教史研究》,北京:《世界宗教研究》,2023年第10期;賀夢瑩:《巴黎高等師

範學院對沙畹漢學研究的影響》,北京:《國際漢學》,2023年第4期。主要譯著有:沙畹:《華北考古記》,袁俊生譯,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年;沙畹:《泰山——一種中國信仰專論》,秦國帥、雷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4年。

③ 王冀青:《法國碑銘學院保寧中亞考察隊研究》,載榮新江、朱玉麒主編:《絲綢之路新探索》,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412頁;Quatrième section. *Délibérations, actes, rapports des commissions, faits divers, Mémoire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 France*, tome 35, 1^{re} partie, 1893, p. 178, 191。

④⑤⑥ Lettre d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t des beaux-art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6 juillet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⑤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le 21 octobre 1906,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Instruction publique, F/17/17270,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 Chavannes, Éd.

⑥⑦⑨⑮④①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le 24 octobre 1906,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Instruction publique, F/17/17270,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 Chavannes, Éd.

⑧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le 5 novembre 1906,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Instruction publique, F/17/17270,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 Chavannes, Éd.

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晚清歐洲人在華遊歷史料》,北京:《歷史檔案》,2002年第4期。

⑪《山東考古物》,天津:《大公報》,1907年9月1日;《要聞》,天津:《大公報》,1907年11月11日。

⑫Édouard Chavannes, *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me I, 1^{re} partie, La Sculpture à l'époque des 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913, Avant-propos, p. 1.

⑬參見沙畹日記,現由沙畹家族後人保存。

⑭⑯陳秋傑:《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建及其影響研究(1907年前)》,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41、45頁;第46頁。

⑰⑱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7 juin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⑲Lettre de G. Lemair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0 septembre 1890, Pék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⑳法國的徵兵制度始創於1798年拿破崙時期,普法戰爭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政府實施不許頂替的普遍義務兵役制,規定年滿19歲、身體合格的男性公

民必須服兵役,同時將體育和軍事教育設為初等學校的必修課程。1811年頒佈的法令,則允許師範學校學生免服兵役。參見徐進:《19世紀歐洲強國的軍隊模式改革與公民軍隊的建立》,長春:《史學集刊》,2008年第5期;伊波利特·泰納:《現代法國的起源:新秩序》,劉毅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第201~209頁。

㉑《法國外交與領事年鑒》(*Annuaire diplomatique et consulaire français*)是法國外交部自1858年起刊印的年刊,詳細記錄了法國的外交架構、駐外人員、各國派駐人員的工作職責及其駐地等行政信息。

㉒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1 septembre 1890,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㉓Brouillon de 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errot, le 21 août 1891, Pari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㉔Lettr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l'Instruction publique, le 20 juillet 1891; Lettre du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2 juillet 18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㉕Lettre de Chavannes au directeur du personnel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7 juillet 18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㉖Lettre de Chavannes au Chef du Cabinet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4 juillet 1891; Lettre de Chavannes au directeur du personnel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7 juillet 1891; Brouillon de lettr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à Perrot, le 21 août 1891; Lettre de Perrot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7 août 1891,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

dividuels, 1^{er} Série :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②⑦ 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le 30 mars 1892, Pékin, Archives nationales (Pierrefitte-sur-Seine) - ENS, F/17/2948, Missions scientifiques et littéraires, dossiers individuels - missions en Chine 1891; Lettre de la Léga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n Chine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2 décembre 1891, Pék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②⑧ Lettre de Chavannes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15 mai 1893, le 19 mai 1893, Pékin,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irection des archives, Personnel Dossiers Individuels, 1^{er} Série: Cartons, No. 914, Chavannes Emmanuel Édouard.

②⑨ Lettre de Chavannes à Henri Cordier, le 4 mai 1893, Ms 5448, pièces 1-162, date 1889-1918, Fonds Henri Cordier, Institut de France; 沙畹致母親的信, 1893年3月23日, 由沙畹家族後人保存。

③⑩ 參見賀夢瑩:《清末外交官與〈史記〉法譯本的翻譯及研究》, 北京:《歷史檔案》, 2022年第4期。

③⑪ *Verhandlungen des fünften internationalen orientalist Congresses gehalten zu Berlin im September 1881*, 2 Theil, Berlin, A. Asher & Co., 1882.

③⑫ ③⑬ Édouard Chavannes, *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 Paris: Ernest Leroux, 1893, p. II, notes 2, 3, 4; p. II.

③⑭ 參見賀夢瑩:《論法國漢學教育的現代化奠基者沙畹之教學實踐》, 台北:《漢學研究通訊》, 2023年第1期。

③⑮ ③⑯ Édouard Chavannes, 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 *Journal asiatique*, sér. IX, tom. XX, 1902, pp. 133-158, 6 figures; p. 159, note 1.

③⑰ 參見賀夢瑩:《法國漢學家沙畹對清末中國時政的評論與研究》, 澳門:《澳門理工學報》, 2022年第2期。

③⑱ Résumé des cours 1906-1907, *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Ernest Leroux, 1907, p. 75.

③⑲ 參見賀夢瑩:《巴黎高等師範學院對沙畹漢學研究的影響》, 北京:《國際漢學》, 2023年第4期。

④⑩ ⑤⑤ Édouard Chavannes, Voyage archéologique dans la Mandchourie et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 *T'oung Pao*, vol. 9, no. 4, 1908, p. 504.

④⑪ Paul Pelliot, Review Ed. Chavannes: Le défilé de Long-men dans la province de Ho-na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02, II, p. 409.

④⑫ Paul Pelliot, Sur les civilisations hindoue et chinoise au Turkestan chinois,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57, décembre 1905, pp. 458-465.

④⑬ Lettre de Chavannes à Pelliot, le 9 mai 1906, 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20-29, correspondance 1906.

④⑭ Chūta Itō, The Cave Temples at Yün-kang, China, *The Kokka*, 1906, XVII, no. 197, pp. 447-455; no. 198, pp. 504-515.

④⑮ 王楠:《伯希和西域考察前的三次中國之行及其早期漢學研究》,《國際漢學研究通訊》, 2014年第10期, 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232頁。

④⑯ Lettre de Chavannes à Pelliot, le 16 décembre 1906, 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30, correspondance 1906.

⑤⑩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1906-1908》, 耿昇譯, 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2014年, 第189~190頁。

⑤⑪ Lettre de Chavannes à Pelliot, le 1^{er} mars 1907, musée Guimet, Fonds Pelliot, Pel Mi 32, correspondance 1907.

⑤⑫ Édouard Chavannes, Voyage de M. Chavannes en Chine, *T'oung Pao*, vol. 8, no. 4, 1907, p. 565.

⑤⑬ ⑤⑭ 伯希和:《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 1906-1908》, 耿昇譯, 第704~705頁; 第711~712頁。譯文筆者略有修改。

作者簡介: 賀夢瑩, 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博士。天津 300071

[責任編輯 陳志雄]